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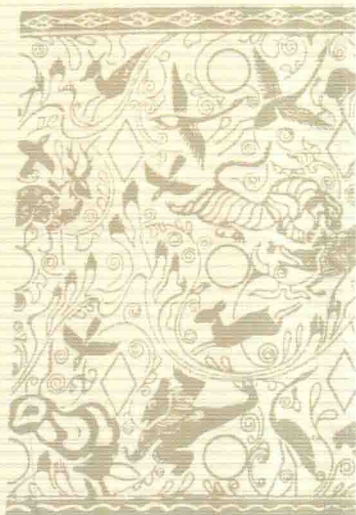
当代浙江学术文库
DANGDAI ZHEJIANG XUESHU WENKU

江浙人口政策比较研究

彭伟斌 著

JIANGZHE RENKOU ZHENGCE BILIAO YANJIU

本书围绕江浙两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政策的演进阶段与人口发展的历史变动这一主线，借助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历史数据以及江浙两省计划生育的有关史料，运用定性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江浙两省人口发展现状与历史变动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并尝试对两省执行不同人口政策之效果进行定量评估，测度政策因素以及社会经济其他因素在江浙两省不同历史时期的绩效。结果发现不同政策殊途同归。在生育率已经显著降低的情况下，政策性因素的作用已经日渐式微，而经济水平与社会发展等其他控制变量已成为决定总和生育率的主要因素。从两省执行单独两孩政策的有关预测结果和人口发展趋势来看，为促进两省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仍有必要在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我国人口政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海外借



当代浙江学术文库
DANGDAI ZHEJIANG XUESHU WENKU

江浙人口政策比较研究

彭伟斌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江浙人口政策比较研究 / 彭伟斌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6

(当代浙江学术文库)

ISBN 978 - 7 - 5203 - 2675 - 9

I. ①江… II. ①彭… III. ①人口政策—对比研究—江苏、浙江 IV. ①C924. 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11997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田 文
特约编辑 丁 云
责任校对 周 昊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esspw.cn>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8. 25
插 页 2
字 数 468 千字
定 价 11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2016年度浙江省社科联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
出版资金资助出版（编号：2016CBZ03）

浙江省社科规划一般课题（课题编号：16CBZZ02）

序 言

解释中国的生育率下降

2013 年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实施“单独两孩”政策，2015 年五中全会又决定实施“全面二孩”政策。虽然这些政策实施的时间还比较短，目前考察分析这些生育政策“新政”对生育率的实际影响可能还为时过早，但是初步结果至少表明，我国生育率并未如某些政府部门或某些人所预言的那样发生大幅反弹。实际上，2015 年我国出生人数还出人意料地出现了负增长。

一个相关的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解释我国的生育率变动。在 1970 年以来我国生育率快速下降的进程中，生育控制政策和有利于生育率下降的经济社会变化都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需要研究两者的影响是如何动态变化的。

弄清楚生育率下降的原因，不但对于解释过去的生育率下降十分重要，对于判断生育政策调整后我国未来生育率的走向也十分重要。如果导致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生育率不断走低的主要原因是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而生育控制政策至多只是次要的原因，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放宽生育政策不会导致生育率的大幅“反弹”，更不会引起生育率“失控”。

长期以来，在如何解释生育率下降的问题上，国内存在不同意见的争论。彭伟斌的新著《江浙人口政策比较研究》是解释我国生育率下降的一个新的重要研究。该书另辟蹊径，以江浙两省为主要研究案例，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江浙两省人口政策的演进与人口变动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分析，并尝试用定量分析方法，测度政策因素与经济社会因素在江浙两省不同历史时期对生育率变动的效果。研究结果发现两省政策殊途同归，在生育率已经显著降低的情况下，政策性因素的作用已经日渐式微，而经济水平与社会发展等其他控制变量已成为决定总和生育率的主要因素。

我本人对这一研究发现表示高度赞同。这一发现的重要政策含义是，在生育控制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不断减弱的情况下，继续实施社会成本高

昂的生育控制政策已经毫无必要。更何况,在我国人口生育率与增长率不断下降,并将在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进入负增长的背景下,值得我们担忧的不是生育率过高的风险,而是生育率过低的风险。

该书作者彭伟斌还建议,为促进两省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需要在全面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人口政策。我相信,未来新发布的人口统计数据将为这一建议提供新的实证支持。我个人非常赞成,尽快取消对城乡家庭生育数量的任何限制,让生育选择权回归家庭,让计划生育回归家庭计划,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出台鼓励生育政策,帮助城乡育龄夫妇解决他们养育子女的实际困难。

我国已经进入经济新常态,需要我们加快供给侧改革的步伐。在我看来,供给侧改革最根本的长远之计是加大对我国人力资本的投入,包括对人力资本的数量与质量的投入。如何鼓励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逐步回升到更替水平,如何为全体人民尤其是学龄儿童提供更加公平和更高质量的教育,如何为全体人民提供更好的医疗保健,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重大课题。

该书是研究人口政策的一个新的重要文献,我愿意借此机会将此书推荐给关心人口政策问题的广大读者。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中国人口学会原副会长
左学金

2017年8月5日于上海

每一种强烈的意识都是生活的源泉，都是我们整个生命活力的基本要素。因此，凡是削弱这种活力的因素都在贬低和抑制着我们自身，也会给我们带来不安和沮丧，就像生命的重要机能停滞和延缓下来所带给我们的感觉一样。所以当我们面临着削弱我们意识的危险的时候，我们势必要坚决地予以还击，把它彻底地清除掉，从而保证我们意识的完整。

—— [法] 埃米尔·涂尔干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	(2)
第二节 研究意义	(24)
第二章 文献回顾:人口政策研究述评	(27)
第一节 人口政策的概念界定	(27)
第二节 人口政策的目标	(32)
第三节 人口政策的研究方法	(38)
第四节 人口政策的决策机制与程序	(45)
第五节 人口政策的效果	(47)
第六节 人口政策的反思	(60)
第七节 人口政策的调整	(65)
第八节 文献研究评述小结	(81)
第三章 基本概念、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86)
第一节 基本概念	(86)
第二节 研究方法	(94)
第三节 研究思路	(99)
第四章 人口政策演进及影响因素:印度经验	(102)
第一节 人口政策演进的政策学诠释	(102)
第二节 人口政策演进的国际案例	(107)
第三节 印度人口政策的演进过程	(108)
第四节 影响印度人口政策演进的因素分析	(128)
第五节 印度人口政策演进的国际启示	(147)

第五章 中国人口政策演进:过程、阶段与特征	(161)
第一节 从全球家庭计划运动看中国计划生育开端	(161)
第二节 中国人口政策的演进过程	(171)
第三节 中国人口政策演进的阶段划分	(188)
第四节 中国人口政策演进的基本特征	(193)
第六章 江浙两省人口政策的形成、发展与比较	(206)
第一节 江浙两省地理区位及人口概况	(206)
第二节 地方性人口政策的形成	(212)
第三节 江苏人口政策的发展过程	(218)
第四节 浙江人口政策的发展过程	(229)
第五节 江浙两省人口政策发展比较	(242)
第七章 江浙两省人口发展现状及历史变动比较	(256)
第一节 江浙两省人口规模及历史变动比较	(256)
第二节 江浙两省人口结构及历史变动比较	(269)
第三节 江浙两省生育水平及历史变动比较	(291)
第四节 江浙两省人口分布及人口负增长区域比较	(301)
第五节 江浙两省人口发展综合水平比较	(308)
第八章 江浙人口政策效果的实证分析与比较	(314)
第一节 理论分析	(314)
第二节 模型构建	(318)
第三节 实证分析	(325)
第四节 结论和启示	(328)
第九章 生育政策调整与江浙人口展望	(331)
第一节 单独两孩生育预测模型	(332)
第二节 生育政策调整对江浙两省人口发展的影响预测	(338)
第三节 结论与讨论	(352)

第十章 新时期中国人口政策的完善和优化	(365)
第一节 从人口表象回归人口真实	(365)
第二节 从短时段回归长时段	(372)
第三节 从政府决策回归家庭决策	(377)
第四节 从计划生育回归家庭计划	(382)
第五节 从新马尔萨斯主义回归马克思主义	(385)
第六节 从政策刚性回归政策理性	(391)
结 语	(396)
参考文献	(402)
致 谢	(442)

第一章

导论

人口是一种重要而长远的“根本性资源”^①，把人口作为一种重要资源，也曾是世界各国的普遍观念。^②正因为如此，人口增长对国家经济增长能力的影响与经济增长对人口的影响同样重要^③。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一度将人口与财富的组合视为治理理性的首要目标。^④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群体，人口在不断运动的过程之中具有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性。

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经济发展和运动的复杂过程造就了人口政策。作为一个国家公共政策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人口政策如何在遵行人口自身发展客观规律性的同时，科学驾驭和把握人口的社会性，特别是如何基于发展的视野来全面透析特定时空环境下人口发展中存在的系列问题，从而准确把握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变迁的基本态势并制定出与之相适应的人口政策，实际上是公共政策科学决策中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难题。正因为如此，人口政策对一国人口发展走向的影响和作用向来充满争议。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人口政策已经实实在在成为一个站在当代世界门槛上的热点问题。人口政策之所以备受国际社会和民众关注，不仅因为它与人们的家庭与个人福祉休戚相关，而且因为它会实实在在地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

制度变迁是历史演进的源泉。^⑤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

① Simon, Julian L. *The Ultimate Resource*;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② 李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共领导人的口控制思想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11期，第37页。

③ [美] 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十一版）》，李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02页。

④ [法] 米歇尔·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⑤ [美] 道格拉斯·C. 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政府都已制定并公布了旨在促进人口缓慢增长的政策,而且通常都是通过家庭计划政策试图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①其中,中国先于改革开放政策的生育制度变迁,不仅已经实实在在地成为影响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历史进程的重要事件,也成为全球家庭计划运动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尽管不是世界上第一个开展家庭计划的国家,但它既是世界上首个有清晰人口政策的国家,也是人口政策最为多元、强制性持续时间最长、政策执行最为严厉、政策过程和结果争议最多的国家。而且,中国还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将计划生育写入宪法并作为基本国策的国家。中国人口政策的演化,如同它的现代化进程一样,既有自身独特的一面,也有世界共性的一面。中国的人口政策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口政策一起,构成全球家庭计划运动及世界人口政策演化历史的一个不连续的整体。

本书基于中国大陆江苏与浙江两省人口政策比较之视角,遵行从整体到局部再到整体的逻辑思路,试图来切入和重温中国计划生育独特的历史进程,以理性评估和科学看待中国人口政策的历史作用和未来走向,为未来中国人口政策的进一步调整与优化提供参考。

第一节 研究背景

一 国际社会对全球家庭计划的总结与反思

人口问题作为令人瞩目的一个世界性社会问题,无疑是近一个多世纪来全球政治经济发展格局中的一个重要构件。大多数人口学家都认为,生育控制的普及是减少世界人口的关键手段。^②从人口经济学的发展历史来看,在经历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的黄金年代后,随着发达国家尤其是西欧人口增长停止,西方经济学家们不再担忧人口增长的威胁,也没有制定人口政策。以国家层面出台的现代人口政策,在马尔萨斯发表

① [美] 吉利斯、波金斯、罗默、斯诺德格拉斯:《发展经济学(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1页。

② [美] 戴维·波谱诺:《社会学(第十一版)》,李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04页。

《人口论》大约150年后才出现。^① 20世纪50-60年代,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将注意力集中于发展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且关注到它们过快的人口增长问题,认为这会制约经济增长并将带来严重的资源与环境问题,也将带来巨大的移民压力。^② 同时,发展中国的许多决策者都断定,较低的出生率对他们的国家是合乎需要的,而且有理由认为,节制生育运动和鼓励性计划在某些时期,能够降低一些国家出生率。^③ 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家庭计划开始充当人口政策的先锋,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脱贫致富的首选方法。作为一个普遍选择的公共政策工具,家庭计划尽管在执行之初遭到了执行国政府和人民的反对,但它最终还是被许多国家所接受,并对全球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1965年一直到1994年,人口控制作为引导全球人口政策的一个主要概念不断被普及推广。^④ 20世纪70年代,美国国际开发署、世界银行和其他一些国际援助机构都非常重视人口政策,并将其视为考核一个潜在受援国发展绩效的重要标准。^⑤ “人口问题是发展的中心问题”几乎成为世界共识。早在1984年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就发现,人口快速增长与私人储蓄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从而对资本深化进程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⑥ 虽然如此,在人口政策的选择上,国际争论仍然较大。1974年布加勒斯特世界人口大会上,各国对如何解决人口增长问题实际上存在较大分歧,以中国、阿尔及利亚、巴西和阿根廷为首的许多国家反对旨在降低人口增长率的政策,而印度等一些亚洲国家却持赞同立场。民族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断言,制度和结构方面的阻力是造成不发达的原因,而不是人口增长。尽管如此,布加勒斯特会议后的十年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领导

① John F. May. World Population Policies: Their Origin, Evolution, and Impact.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Spinger, 2012: viii.

② Amartya Sen. Population: Delusion and Reality.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 41, No. 15, 1994: 3.

③ [美]朱利安·L.西蒙:《人口增长经济学》,彭松建、周维、邱沛玲、蔡文眉、胡键颖、李运宽、王德中、南钟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35页。

④ Paige Whaley Eager. Global Population Policy: From Population Control to Reproductive Rights. Printed in Britain by Antony Rowe Ltd, Chippenham, Wiltshire, 2004: 1.

⑤ [美]吉利斯、波金斯、罗默、斯诺德格拉斯:《发展经济学(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9页。

⑥ 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发展报告》,1984年,第51—206页。

人都比较支持家庭计划了。一些原本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持批评态度的国家,其中最明显的是中国,在1984年墨西哥召开的第二次世界人口会议上,反而成了家庭计划活动的主要支持者。^① 据联合国人口报告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全球有127个国家的政府都在某种程度上支持家庭计划,这些国家涵盖了世界人口的94%。^② 其中,有34个国家采用人口政策和项目来降低生育率,另有32个国家出于非人口统计学目的以及健康和人道主义考虑提供家庭计划服务。家庭计划覆盖了发展中国家的25亿人口,相当于当时居住在农村地区人口总数的90%。^③

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国内泛起了日益增长的反对在人口经济问题上采取限制人口增长的观点,批评的声音指向国际人口项目援助,认为有关国际援助纵容了中国等一些实行强制性计划生育的国家侵犯人权。受此影响,美国政府对人口增长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立场反而采取了保守的态度,甚至在1984年的会议上劝说发展中国家转变到自由市场,以免政府过多地陷入经济与人口事务的纠纷之中。这一年,美国出台的《墨西哥城政策》(Mexico City Policy)明确要求所有接受美国联邦政府经费补助的非政府组织,不得在美国境外从事或推动和堕胎有关的事务(因强奸、乱伦和孕妇生命危险而堕胎的除外),也不提倡将堕胎作为推行计划生育的一种方法。^④ 这使有关人口的政策性讨论变得十分慎重而且极为复杂。1986年美国科学院有关“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政策问题”的研究报告甚至得出了模棱两可的结论。^⑤ 即使还缺乏充分而定量的科学证据,仍有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领导人认为控制人口的措施是明摆着的好事。正是

① [美] 托马斯·梅里克等:《世界人口转变》,何晓勤、步金玲、严春松译,上海图书情报中心,1987年,第24页。

② [意] 马西姆·利维巴茨:《繁衍——世界人口简史(第三版)》,郭峰、庄瑾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8页。见“Law and Policy Affecting Fertility: A Decade of Change,” Population Reports, Series E, Nov. 1984: E-117。

③ W. Parker Mauldin. Assessment of National Family Planning Program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tudies in Family Planning, Vol. 6, No. 2, 1975: 30.

④ Policy State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t the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pulation. Reprinted i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10, No. 3, 1984: 574-579.

⑤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Committee on Population, Working Group 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Population Grow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olicy Questions.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86: 90.

基于这一判断,发达国家仍坚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人口项目援助。^①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普遍认识到,应在充分尊重个人权利的情况下确保制定人口政策的合法性。1993年克林顿中止了墨西哥城政策。1994年开罗人口大会确定将持续发展置于人口问题的核心,并终止了“人口控制”的概念,认识到小的家庭和减缓人口增长速度不是取决于控制,而是取决于自由选择。^②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政策也由单一的数量控制向提高人口素质和优化人口结构转变。^③2001年,布什总统上任伊始又恢复了禁令,甚至批评国际人口基金会支持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强制堕胎和实行非自愿绝育。这一反堕胎取向的《全球禁制通令》甚至被反对者抨击为“全球限制自由法”,有关研究甚至认为该禁令并没有达到限制堕胎的效果,反而严重扰乱了家庭计划服务,增加了堕胎的数量,而且侵犯了受资助国的主权。^④2009年,奥巴马签署总统令撤销了这一禁令,认为联邦政府为国际援助设定的条件过于宽泛,这些条件已经破坏了那些努力促进外国实施安全有效的自愿性家庭计划方案,国务卿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管理员必须放弃现有的早就应该放弃的附带性补助条件。^⑤近几年来,美国政府有加大资助国际家庭计划领域组织力度的倾向,在强调家庭计划去政治化的同时,也要求国际援助组织应在减少贫困、改善妇女和儿童健康、预防HIV/AIDS以及为154个国家的妇女提供计划生育援助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家庭计划领域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⑥更加强调人的发展和人文关怀,更加关注妇女自己、自主、自由决定是否、何时以及生育多少孩子的权利。

① [美]托马斯·梅里克等:《世界人口转变》,何晓勤、步金玲、严春松译,上海图书情报中心,1987年,第40页。

② <http://www.unfpa.org/6billion/populationissues/program.htm>. Population, Issues, 1999.

③ 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国际会议行动纲要》,开罗,第1994页。

④ Barbara B. Crane, Jennifer Dusenberry. Power and Politics in International Funding for Reproductive Health: the US Global Gag Rule. Reproductive Health Matters, 2004, Vol. 12, Issue 24: 128.

⑤ Amanda Adams. Obama Withdraws Family Planning Policy, Restores Some Nonprofit Speech Rights, <http://www.foreffectivegov.org/node/9641.1> - 28 - 2009.

⑥ 代表性的如 Family Planning 2020 (FP2020), <http://www.familyplanning2020.org>。FP2020是一个与政府、民间社会、多边组织、捐助者、私营部门以及研究和开发社区密切合作的国际性组织,其目标是在2020年前采用避孕药的妇女达到1.2亿,该组织是2012年伦敦家庭计划峰会的成果。超过20个国家的政府在峰会上做出承诺,要扫除女性在获取避孕信息、服务和用品中存在的政策、资金、配送以及社会文化障碍,有关捐助者也承诺额外追加26亿美元。

上述分析表明,家庭计划作为一个国家人口政策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政策选择和政策过程并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国家内部的公共事务问题,而是超越国界发展成为一个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发展问题。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重要影响。近半个多世纪来,美国一直将国外人口政策置于首要位置,代表美国政府立场的美国联合开发署以及其他一些国际性组织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展了一系列人口项目与活动,显著地影响了这些国家的人口政策制定与实施。二战以后,美国十分关注亚、非、拉广大地区发展中国家的所谓“人口爆炸问题”,这大大超过了他们对国内人口问题与人口政策的关注。例如,1965年美国国家科学院编写的《美国人口的增长》报告中开篇就谈及国际人口问题,认为人口增长与规模问题不仅是亚、非、拉广大地区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美国的重大问题,从而成为美国重视国外人口政策的根据。^①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美国一直是全球家庭计划领域从资金援助、技术支持到人员培训的最大援助国。美国国际开发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在全球家庭计划革命运动的历史进程中扮演着非常积极的角色。

回顾全球家庭计划这段历史,不难看出,其实在国际援助组织热心推进发展中国家家庭计划项目的同时,有关总结和评估的理性之声就一直存在。要对这些新出现、广泛存在且分散的家庭计划项目进行评估,面临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难题。^②早在1971年,发展经济学家戴维斯就指出,家庭计划项目不应该指向人口控制和计划,也不应该用来作为生育控制的工具。简单设定的生育控制目标不仅会带来十分复杂的社会经济弊端,也使人口自身的问题变得更复杂。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不适用的人口统计学模型,误导了发展中国家人口政策的制定和实施。^③实际上,在开罗会议上,关于人口增长问题缺乏宏观紧迫性和微观层面上对生殖健康和权利的过度关注的结合,导致几乎完全重新形成全球人口政策和策略。《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明确要求放弃人口和家庭计划项目目

① 戴世光:《评美国人口政策》,《人口研究》1978年第1期,第23页。

② W. Parker Mauldin. Assessment of National Family Planning Program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tudies in Family Planning, Vol. 6, No. 2, 1975: 30.

③ Davis K. Population Policy: Will Current Programs Succeed?. Science, Vol. 162, 1967: 1243-1248.

标,支持一种更广泛的政策议程。除了一系列旨在赋予妇女权利并强化她们权利的社会和经济政策措施外,还包括一系列生殖健康措施,包括迎合妇女整体生殖健康需求的家庭计划。人口问题并非开罗议程的重要部分,而是一度到会议行将结束之际差点被忽略的部分。开罗会议后,家庭计划几乎成了完全被遗忘的术语。实际上,《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关于节育服务的主要章节在预备会议的文件中已经被命名为“家庭计划及生殖权利和健康”,在180多个代表团出席的会议所采用的最终版中仅被称为“生殖权利和生殖健康”。^①

尽管如此,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计划生育并未回到国际社会的新共识上来,人口控制和节制生育的指向性十分明显。有关的实证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20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末生育率的下降,其中43%应归于计划生育发挥的作用。在此期间发展中国家发生的避孕使用增加和生育率下降的革命很大程度上是政策和项目干预的结果。^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社会早已认识到,发展中国家人口政策选择应该摒弃单一的家庭计划。那种认为家庭计划与发展彼此相悖的观点是一种逻辑上的二律背反。事实上,家庭计划与经济发展都有助于生育减少的人口转折的完成,单靠家庭计划难以降低生育率。^③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家庭计划开展情况来看,由于生育受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社会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试图通过单一性人口政策来惩罚公民的生育行为以达到有效控制人口的目的,实施起来往往非常困难且耗资巨大。在20世纪60—80年代,在许多没有实施家庭计划的欠发达国家中,生育率已经出现了显著而快速的下降。从这一点来看,家庭计划对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可能被夸大了,发展中国家的那些热衷于家庭计划的人口政策制定者们应该从中汲取足

① Warren C. Robinson, John A. Ross. The Global Family Planning Revolution: Three Decades of Population Policies and Programs. The World Bank, 2007: 10.

② John Bongaarts. The Continuing Demographic Transition, Edited by G. W. Jones et al.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422-443.

③ [美] 吉利斯、波金斯、罗默、斯诺德格拉斯:《发展经济学(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7页。